

● 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研究丛书

邓小平经济发展论

汤照连 主 编
郭小东 副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F092.7 U13

T23

邓小平经济发展论

汤照连 主 编

郭小东 副主编



A0770964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景泉
责任编辑：王为理
封面设计：迪 赛
责任技编：孔洁贞
黎碧霞
责任校对：侯毓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小平经济发展论/汤照连主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12
(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研究丛书)
ISBN 7-218-02621-4

I. 邓…

II. ①汤…②郭…

III. ①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②经济思想-邓小平-研究

IV. F092·7

邓小平经济发展论

汤照连 主 编

郭小东 副主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世纪电子媒介有限公司排版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厂址: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工业区 205 栋二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625 印张 2 插页 250,000 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218-02621-4/F·399

定价: 3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1978年12月18~22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极其深远意义的日子。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作出了重大的决策，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近20年过去了，这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瞬。然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成就，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建立，对外开放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人民生活状况显著改善。总之，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显著成绩，举世瞩目！

神州大地的巨大变化，受到世界上许多著名政治家、经

济学家的高度评价。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指出：“如果在今后20年里中国的经济仍按每年7.5%~8%的速度增长，它将成为一个经济巨人。到2020年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将高于美国。”“中国将使世界平衡发生巨大的变动。从现在起的30到40年内世界将找到一个新的平衡。谁也不能武断地说，这仅是一个新的角色。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角色。”^①已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其遗著《超越和平》中写道：“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在下一世纪成为最富有的国家。”“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个军事和经济强国。”^②面对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最近指出：“我们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在2010年以前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也许所需时间稍长一些。”“我的推测，是在今后5年里，他们的经济年增长率将为8%到10%，而且通货膨胀率将会大大降低。”^③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指出：“我对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辉煌成就有深刻印象。中国认识到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给过去在中国被束缚的人们许多新的机会来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是你们的目的。给予人们机会，我希望能继续下去。如果能继续这样，你们将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④

① 李光耀：《在第四届欧洲东亚经济首脑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转引自《参考消息》（1995年9月22日）。

② 《参考消息》（1994年4月25日）。

③ 《参考消息》（1995年9月24日）。

④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评说中国经济与经济学发展》，中国计划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其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则是邓小平所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其中对改革开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直接起着指导与推动作用的经济发展理论。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是在新的国际背景和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实践经验以及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的光辉体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作出许多重大贡献,而且对第三世界为谋求摆脱贫困、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极为珍贵的启示。

毫无疑问,深入学习研究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不仅对指导、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与发展的伟大事业继续前进具有重大理论与实际意义,而且,对推动国际间相互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章 总论：西方发展经济学 和邓小平经济发展论

第一节 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

西方发展经济学，是本世纪 40～70 年代开始产生和逐步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经济学科。它通过对各种发展理论和战略、经济体制和可行性对策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不发达条件下经济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借以促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摆脱贫困落后状况，实现现代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民

族独立国家迫切希望迅速改变经济和社会不发达的现状，而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却已经不能解决发展中国的经济问题。于是，西方经济学家逐渐认识到当代不发达经济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而一方面，除了继承自古典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流派有关经济发展的主要观点外，另一方面，又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修正，致力于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为了全面了解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必要追溯西方早期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以及中国早期经济发展思想。

一、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

经济发展理论，即关于国民经济实现发展的理论，一直是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已对其给予极大的重视和作出过许多理论分析。

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创立者的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主要就是研究促进或阻碍资产阶级财富发展的原因，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主义制度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他强调国民财富的增长决定于专业分工、人口和资本积累；重视储蓄在财富增长中的作用；认为对外贸易可以促进发展；特别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实行自

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等等。这些都被后来许多发展理论视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正因为如此，在西方，亚当·斯密被推崇为“把经济发展问题看做进行分析的总题目的第一个人”^①。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另一杰出代表和完成者大卫·李嘉图，把阐明和研究财富在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看做是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他所阐述的整个理论体系中，蕴涵着不少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观点。在他看来，经济发展即生产的增长，而生产增长决定于经济剩余（最终产品即消费者最后直接消费的产品价值扣除付给的最低工资后的差额）的多少；经济剩余由资本家用于购买机器设备、雇佣劳动力，从而实现生产不断扩大。李嘉图重视人口、土地、自然资源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还主张自由贸易，认为这种政策有利于扩大市场，有利于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最终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他所提出的根据生产成本相对优势自由发展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学说，被后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誉为古典经济学成熟的国际贸易理论，也是发展经济学家主张发展中国家由封闭型经济模式过渡到外向型经济模式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并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深刻“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②的伟大著作，特别是其中关于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的理论更

①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页。

是精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问题。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理论，通过揭示资本和资本积累的本质，创立有关资本有机构成的原理，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唯一源泉，而资本积累又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在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应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成为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最有力的杠杆，从而使资本技术构成发生变化即生产资料的量比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相对增长，从而造成一个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即失业人口。上述马克思所阐明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蕴涵着极为丰富的经济发展理论。例如，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关于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关于合理的产业结构、按比例分配社会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等等，不仅对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问题有重大理论价值，而且对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问题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三卷中所阐述的关于社会经济在生产与流通的统一中实现发展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按照这一理论，在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中，生产起决定作用，生产决定流通；而流通反作用于生产。这对于搞好社会主义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经济活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中，还直接论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状况，这些都包含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思想与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

量的指导意义。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著名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列宁认为，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因而生产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和完善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最快，因此，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一个客观规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他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所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开始于1921年春季，其主要标志是取消余粮征集制，改征粮食税，从而结束了原来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实行粮食税，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以税收形式上交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后，可以把余下来的部分拿到市场上去出卖；同时，也允许小商品生产和商业有适当程度的发展，利用商品货币关系，通过市场，建立起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还主张实行租让制和租借制，即同当时俄国国内的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签订合同，允许他们经营木材的伐运，煤、石油、矿藏的开采等业务，但必须把其中一部分产品付给国家。“根据合同，资本家在一定期限内是一部分国家财产的租借者，但不是所有者。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①列宁所设想的租让制和租借制，虽由于当时俄国国内外经济政治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实行，但这仍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重大突破。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9页。

二、中国早期经济发展思想

在中国，早期经济发展思想的发轫，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中叶。

当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惨遭失败，面对西方侵略者的猛烈冲击时，先进的中国人就已开始了对国家独立富强道路的艰苦探索。以后，在一百余年中，经济发展问题始终成为中国经济理论的主题，其重点在于探索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才能走上工业化、近代化的道路，走向独立富强。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驱林则徐、魏源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简明口号，主张学习西方，仿造船炮，继而发展新式工业，揭开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实现工业化的序幕。随后，一批对西方社会有较多了解的知识分子相继提出了富国强兵的主张。其中，中国第一个留美的容闳建议发展新式教育，培育人才，以推动工业化、近代化的进程。曾在香港滞留多年的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在其著名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中，分析世界大势，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发展新式工商交通业，“与番人并雄”。第一个留欧学习商科的洋务“俊才”马建忠，发表《富民说》，倡言“民富而后国强”，鼓吹重商主义。作为清廷早期外交大使，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基于对西方新式工业有深切的感受，提出了“用机器殖财养民”的新见解。近代著名的爱国企业家、思想家郑观应，在其名著《盛世危

言》中，力主发展民族工业和全面振兴“商务”，与西方进行“商战”。

甲午战争后，在列强进一步加紧对中国侵略压迫的危急情势下，发展新式工商业的呼声更为高涨。康有为、梁启超凭借其对西方经济知识的了解，更为明确地提出实现中国工业化、近代化的新概念：“定为工国”，“以工立国”，“讲求物质”，务求“全变”。特别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堪称中国早期经济发展思想的杰出代表的孙中山，提出了民生主义的经济学说和经济纲领。他精心制定的《实业计划》，构想了规模恢宏的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建设蓝图，力图通过对外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利用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外国人才以发展中国“实业”，“后来者居上”，赶超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清末状元、大企业家张謇的“棉铁主义”，^①则另具特色。中国早期经济思想纷然杂陈，走上了逐步形成的阶段。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工业化、近代化道路已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围绕这一主题，在中国涌现出一大批学者，他们提出了许多见解，设计了各种方案，进一步发展了中国近代早期经济发展思想。特别是在探讨有关中国工业化的含义、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和发展手段等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发表了不少有创见的经济发展观点。诸如王学文的

^① 张謇，清末状元，著名企业家。他认为，西方各国“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不同意“商务立国”的口号，后来进一步提出“棉铁主义”，主张实现中国工业化，必须把棉纺织业和钢铁业摆在首位。

“经济二元结构论”^①，谷春帆的“贫困的恶性循环论”^②，以及张培刚的“中心与外围”^③理论等等，表明中国早期经济发展思想在某些方面并不比西方学者逊色，在发展经济学的形成中，中国学者也曾作出重要贡献。

三、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西方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性、应用性和独立性的经济学科，其产生与发展是与同时期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分不开的。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系列原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纷纷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面临着共同的历史性课题，就是要摆脱长期的贫困而走

① 王学文在1925年发表的《中国经济现状概观》一文中，注意到了旧中国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指出：“今日中国经济有二种不同之代表形态，旧时低级之封建经济与新兴高级之资本主义的经济交错并在。”见《王学文经济学文选》（1925~1949），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② 谷春帆：“建设中国产业资本，似陷入矛盾中，吾们既不能节约，又不能消费，既不能供给资本，又不能供给市场。”（《中国工业化之国内资本问题》，《经济动员》第4卷，第10、12期）

③ 张培刚在分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时，最早揭示了后来被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与外围”理论。他明确指出：由于工业国与农业国在“需求的收入弹性”、“供求弹性”和“生产调剂弹性”上的差异，在农业国与工业国的贸易中，农业国的条件总是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

向富裕，改变普遍落后的状况而走向现代化。正是在此背景下，西方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制度、文化历史、人口和自然资源以及工业基础等方面的条件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它们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特殊性。因此，传统的经济理论，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对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已经不能适用。于是，西方经济学者转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他们著书立说，提出了许多理论观点、发展方案。从 50 年代起，就开始出现专门的发展经济学著作，以后，这类专著逐渐增多，还出现了一大批所谓发展经济学家。其中有十位著名学者被 1984 年世界银行出版的《发展的先驱》一书誉为对西方发展经济学有突出贡献的“先驱者”。他们是：鲍尔（P. T. Bauer）、克拉克（Clark, Colin）、赫尔曼（A. O. Hirschman）、刘易斯（A. Lewis）、缪尔达尔（G. Myrdal）、普罗维什（P. Prebisch）、罗森斯坦—罗丹（P. N. Rosenstein—Rodan）、罗斯托（W. W. Rostow）、辛格（H. Singer）、丁伯根（J. Tinbergen）。其中，刘易斯、丁伯根和缪尔达尔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必须看到，迄今为止，西方发展经济学所追求的目标是在不发达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其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这就决定了西方发展经济学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要而言之，它没有能够解决第三世界多数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的问题，尤其是没有能够解决这些国家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实现经济独立自主，以及取得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的问题。尽管如此，西方发展经济学提出的

总体理论架构,以及某些思路、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是有其合理成分的,在理论和应用范围内是有很大学术价值的。例如,西方发展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区分,提出了防止有增长无发展的问题,意义十分重大。又如关于人均国民产值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尺度的规定,为不同国家间进行横向比较和同一国家不同时期进行纵向比较提供了一个基本标准。许多学者对于人口、资本、工业、农业、贸易、财政、金融、科技、教育、区域、环境等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分析,值得重视。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结构论”以及费景汉、拉尼斯对此的补充、修正,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特征。科林·克拉克关于人口在三大产业间的分布和经济发展阶段相互联系的分析,钱纳里和斯特劳特在探讨利用外资时所提出的“两缺口分析”或“两缺口模型”,以及弗朗瓦、佩尔鲁克斯在区域或部门的经济发展方面所提出的“发展极”的概念,等等,都可以给人们以很大的启发和借鉴^①。

有必要指出,发展经济学并不是西方经济学家的专利品。50年代以来,日本、苏联、东欧等国家,也有不少经济学家专门从事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开始了发展本国经济的理论探索 and 实践活动,构成了当代发展经济学一个重要源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

^① 见陶文达主编的《发展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6~477页;魏坝、张仁德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论》,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也极重视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近年来，我国许多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十分关注对经济发展战略的探讨，重视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并总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经验教训。在邓小平经济发展论指引下，我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它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济发展理论，也批判地吸收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节 邓小平经济发展论的形成和发展

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① 这一精辟论断，对探讨邓小平经济发展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过程，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①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